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值班责编：李牧鸣 刘小草
邮箱：worthreading01@163.com 电话：(010) 88051377



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沙可夫和许多憧憬着美好未来的年轻人，来到江西瑞金，在一栋土墙瓦屋中，以笔为武器，记录着时代的石破天惊。

《红色中华》，那名字中的一团火红，代表着这一群年轻人对新中国的热切向往，那一篇篇文章，都是他们为新中国勇猛战斗的足印。

88年来，新华精神穿越流淌的岁月，融入新华人的生命，一代代新华人始终践行“对党忠诚、勿忘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新华精神，记录下时代风云，书写着不朽历史。

致敬，88年前炮火硝烟中的新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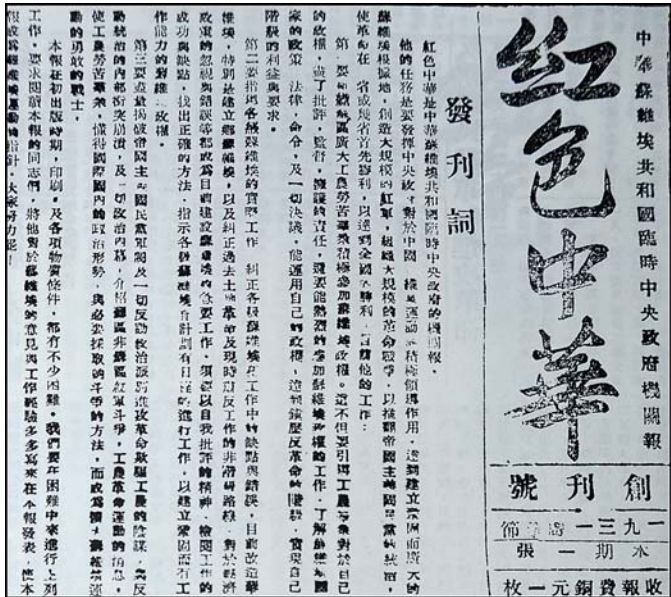
八十八年，不变的初心使命

「数读」「画说」《红色中华》

 王观澜 1931年11月至1932年8月任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的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王观澜曾任农业部副部长等职务。	 周以栗 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任《红色中华》报第一任主笔。1934年11月在战斗中牺牲。	 李伯钊 1931年12月至1932年初任《红色中华》报编辑。新中国成立后，李伯钊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钱希均 1931年至1934年任《红色中华》报发行科长。新中国成立后，钱希均曾任轻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等职务。	 李一氓 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任《红色中华》报主编。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	 杨尚昆 1933年1月至3月任红中社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杨尚昆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等职务。
 沙可夫 1933年1月至8月，任红中社编委会主任。离任后，仍在苏区，主要负责文艺工作，写剧本等。年底离开瑞金去上海治病。新中国成立后，沙可夫曾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韩进 1933年春参加红中社工作，后任红中社编委。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苏区与瞿秋白等一起继续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	 任质斌 1933年5月参加红中社工作，后任红中社秘书长。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主持了红中社广播恢复与《红色中华》报复刊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质斌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等职务。	 瞿秋白 1934年2月到达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兼红中社社长。1935年1月被捕，6月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	 向仲华 1936年春参加红中社工作。1937年1月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后，负责编辑《新中华报》，1938年负责新华社工作。1939年初至1941年11月任新华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向仲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广州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务。	 廖承志 1936年12月参加红中社工作。1937年3月到10月间，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具体领导新华社工作。1946年7月到1949年6月担任新华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曾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第十二次政治局委员等职务。

▲红中社工作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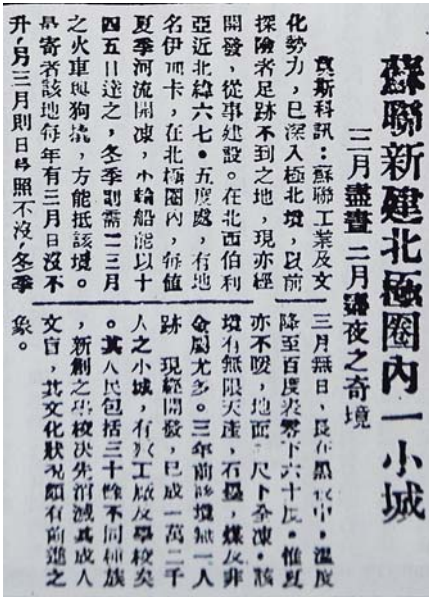
▼创刊号发刊词。



▼贪污分子郑茂德漫画。



▼北极小镇报道版面。



全世界。

一个月后的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1932年2月4日起，《红色中华》改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办的中央机关报。

有很长一段时间，红中社和《红色中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1932年底，《红色中华》编辑部专职人员也就两人。

编辑李一氓住在瑞金城，与编辑部所在地相距十里。每周六下午，他从瑞金城骑马到叶坪村，利用中央政府大厅做编写工作，晚上则随便找个地方过夜。第二天吃完午饭，发了稿，他又骑马回城。

29岁的李一氓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战士，24岁参加南昌起义，任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还曾在上海从事党的保卫工作。1932年10月到1933年1月，他主编了约三个半月的《红色中华》。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红色中华》在中央苏区出版了240期，发行量从最初的三千份增至四万多份，超过当时著名的《大公报》。

瞿秋白是苏区时期最后一任红中社负责人。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领导工作人员继续出版了24期《红色中华》，直至1935年1月，掩护了红军主力转移，激励了苏区军民继续战斗。

苏区的读者亲切赞誉《红色中华》是“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全苏人民的喉舌”。

“时至今日，《红色中华》依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红色宝藏，成为研究中央苏区历史的权威资料。”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梅黎明赞叹道。

作为党史专家，梅黎明去过全国各地许多革命历史博物馆。他留意到，这些博物馆在介绍相关史料时常常引用同一张报纸——《红色中华》。

从2013年开始，历时五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组织全体老师将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红色中华》《新中华报》影印本整理成电子文本，总字数约1520万字，

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更多人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以及红色新闻史提供了资料来源。

1935年11月25日，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中社恢复新闻文字广播，《红色中华》复刊，当时并不知道瞿秋白在苏区继续出版《红色中华》，因而接续长征前的期码，为第241期。

1937年1月，迁入延安的红中社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1月29日，共办了324期的《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在延安继续出版。

“高频词”里的苏区面貌

烟云不曾过眼去，作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耳目”“喉舌”，《红色中华》见证了共产党人执政预演的初心与使命，记录了苏区军民战斗生活的点点滴滴。

记者运用新华智云“媒体大脑”对《红色中华》进行的高频词大数据分析发现，“群众”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出现了10886次，仅次于关注次数最多的“红军”，后者出现了13316次。

千百年来，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从未发生如此新奇的变化。农民获得土地，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妇女翻身解放，儿童实行义务教育，全体苏区人民享受民主权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红色中华》在创刊号上刊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就揭示了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红色政权属于人民。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刘付春分析说，积极动员根据地军民投身苏维埃各项建设是《红色中华》宣传报道的第一要务，它以命令、条例、指示等形式刊发各类公文达473则，内容涉及苏维埃建设的方方面面。

“所有农夫农妇儿童等都带着满脸的微笑争先恐后地跑上前来欢迎我们……”1933年3月30日，第65期《红色中华》用一个整版报道了苏维埃干部、

红军战士组织春耕突击队帮助群众开展春耕的情况。

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是《红色中华》关注的主要内容。“发展”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出现2779次，“经济建设”出现677次，“春耕”出现948次。

激烈的反“围剿”战事，一直是《红色中华》关注的重点，“敌人”“革命战争”“围剿”分别出现3843次、1586次、1263次，排在高频词前100位。《红色中华》通过报道红军胜利的消息，激发全国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决心和信心。“胜利”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出现4039次。

1931年12月14日，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官兵1.7万余人成功举行“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创刊3天的《红色中华》登载通讯《宁都的大兵暴》，报道了起义的经过。

“红军第五军团，自成立后，到处受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起义成功后，瑞金举行了欢迎大会，起义将领由毛泽东等陪同，参观了红中社。《红色中华》以《五军团派代表参观各机关》为题刊登了消息。

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意识到，唯有斗争，才能胜利。在《红色中华》，“斗争”一词出现3895次，其中“思想斗争”“群众斗争”“武装斗争”分别出现100次、139次、46次。

“《红色中华》创办于艰难战争岁月，她通过刊发社论、宣言等号召群众武装起来，开展革命的民族战争，求得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刘付春介绍说。

1936年1月3日，已在瓦窑堡复刊的《红色中华》专门刊发新年献词，庆祝“革命新年”。

“一九三六年已经开始，一幅幅斗争的图画展开在我们眼前。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四省我们数万英勇的人民革命军正在和血腥的日本强盗，进行艰苦的战争……我们希望一九三六年的革命大风暴与大火焰将把日本帝国主义卷到汪洋大海中去。”

刘付春介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全国人民

抗日浪潮高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那一时期《红色中华》的重要内容。

观察全球，报道世界

中央苏区地处偏僻，但那里绝不是个封闭的小山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时刻放眼打量着这多彩又多变的世界，《红色中华》亦观察全球，报道世界。

在北西伯利亚，有一座位于北极圈内的名叫伊加卡的小城，那里生活着三十多个民族，夏季河流开冻之时，小轮船行驶十四五天就能到达，冬季则是漫漫长夜，温度能下降到零下六十摄氏度。

1933年1月，《红色中华》一则《苏联新建北极圈内一小城三月尽昼三月尽夜之奇境》的消息，向读者介绍了伊加卡的情况。

那时，北极对苏区群众来说，已不算太过陌生，“北极”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共出现15次。只不过，当读者还在畅想这片遥远之地时，宁静总是被战火打破。

《红色中华》较多转载塔斯社、路透社等国外通讯社稿件，内容多关乎莫斯科、伦敦、华盛顿这三大信息中心。根据数据分析，“苏联”出现次数高达3432次，“美国”出现692次，“德国”出现648次，“英国”出现506次，“非洲”“美洲”分别出现14次、10次，周边邻国“印度”“朝鲜”等分别出现58次、79次。

对同一区域的报道主题较为相似，涉及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内容多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涉及美国、英国的报道，多反映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及工人运动。

当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不过十余年。《红色中华》以极高的热情，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既亲切又遥远国度的一举一动。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建立了国家工业化的强国基础，第二个五年计划，更注意于国家电气化一项，最近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发关于建立水电工程的命令。”

《红色中华》专门登载《苏联三大水

电工程计划一九三五年完成》，介绍苏联水电事业建设。

在遥远的北冰洋，苏联已在沿岸各站建立无线电台，以便更深刻地研究北冰洋的特殊环境。

“先前在北冰洋过冬的旅客，多是与世界隔离的，但现在却可以和外间通报，不如昔日之孤独了。”《红色中华》以欣喜的口吻报道了这则苏联开发北冰洋建立无线电的消息，向苏区的读者介绍着“在胜利中前进着的苏联”。

《红色中华》尤其关注邻国日本的动态。据刘付春统计，《红色中华》登载的国际要闻、国际消息936则。其中，关于日本的报道593则，占比达63%。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绝续的紧要关头。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并通过《红色中华》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以及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对日妥协，放弃国家主权的可耻行径。

1933年4月2日出版的《红色中华》，以大量的笔墨报道了日军对中国的屠杀行径。

“日军自三月二十一日起，又增调辽吉黑三省留守部队，开集辽西绥中一带……同时日军以二十余架飞机，掩护轰炸，低飞投弹，劳苦群众死伤甚多，房屋被烧的，触目都是，一眼望去，尽成焦土，使人感到无限的伤心惨目！”

1934年7月31日，《红色中华》记者专门“晋谒中央政府毛主席，访问关于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

《红色中华》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题为《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文章。这篇谈话揭露了国民党不顾民族危亡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举进攻苏区，阻挠红军北上抗日的事实，表达了红军将士彻底粉碎国民党“围剿”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下转10版）